

治。  
《港區國安法》實施後，許多民主派支持者不再積極發聲。您認為港府應如何更準確地掌握民情？

經歷二零一九年的社會動盪和《港區國安法》頒布之後，民調數字反映持中間意見「一半半」的比例增加，表示「不知道／很難說」的比例，以及認為自己的政治傾向屬於「中間派」的比例如，較以往增加。這些現象反映受訪者社會態度趨向謹慎，但不能直接認為是「不再積極發聲」，甚至得出民意扭曲的結論。社會

動盪結束後，社會情緒一般會從觀點兩極對立的亢奮狀態回歸理性狀態，民意取向中間回答、不再立場鮮明，這是回歸理性的反映。

另外，大量反對派支持者選擇離開香港，官方離港數字以十萬計。反對派大量離去後，中間派所佔的比例相應增加，民調數字自然反映了人口社經組成的變化。當社會情緒回復穩定，政治爭拗緩和下來後，社會大眾必然會更關注政府的施政成效和表現，所以政府須在打拼經濟、改善民生等方面做出成績，才能爭取市民

認同和支持。

您長期從事民調工作，隨著社會變化，可否說說民調工作近年是否也有變化？

科技日新月異，社會轉變急速，價值觀念亦有了很大轉變，民調工作亦難免出現巨大變化。對於民調工作而言，由於近年越來越多電話及網上騙案，市民在接受不明電話時都十分小心。另外，市民亦較過往重視私隱，對個人社經背景資料有所保留，所以對於陌生人的電話，往往要多次檢查確認，知道確實是大學打來的電話，才願意接受調查，這

自然增加了電話調查的難度和成本。還有一點，現在市民大眾接受電話調查的耐性亦較以往低，訪問時間不能太長，這亦局限了調查的深度與廣度，需以其他研究方法如深入訪談等作補救。

您多年從事民調工作，有無哪些民調影響政府施政？或者有無一些有趣或難忘的事情？

民調數據對政府施政的影響不是單一、直接、顯而易見的。但正如前述，民調數據是政府施政必不可少、無可替代的一環。我記得前

我如浮雲」，但眾所周知的現實是，他特別聘請了顧問為他大做「民意工程」，尤其藉輿論主導民情，可見不少人哪怕口說民調沒價值，但實際上仍不能低估民意的作用。

我較為難忘的反而是梁振英與唐英年爭奪特首寶座時的民調數據。那時我們持續地進行「滾動式」調查，可以看到「人民眾支持度由原來唐英年居於上風，到爆冷建風波後的急跌，然後是梁振英支持度急速上揚，至差距不斷擴大，結果唐落敗，梁成為特首。